

新时代越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构建策略分析^①

郑红莲 张 晨



摘 要:在新时代这一大背景下,构建越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不仅顺应时代发展需要,而且有助于传播越文化的独特价值,推动越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合作交流。该文首先基于对越文化发展脉络和显著特点的梳理,讨论了越文化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意义。接着,分析了越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构建所面临的诸多挑战,认为主要存在于外来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发展机制亟待创新,以及对外交流话语体系的内部架构有待加强等3个方面。在此基础上,鉴于越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构建是“中国内容、国际表达”的积极实践,该文最后提出并具体论述了越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构建的3个新策略:第一,提炼具有鲜明越文化特色的标识性概念;第二,创新认知框架,凸显越文化价值;第三,讲好越地故事,增强文化话语叙事能力。

关键词:越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文化话语;策略分析

Strategy Analysi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cursive System of Yue Culture in the New Era ZHENG Honglian ZHANG Chen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cursive system of Yue culture in the new era could not only comply with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times, but also help to spread the unique value of Yue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Yue culture. This paper firstly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constructing the international discursive system of Yue culture based on the review of development context and salient features of Yue culture. Then it is argued that challenges of discursive system construction mainly lie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 impact of foreign culture on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culture needs innovatio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discursive

^① 本文为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重点课题“新时代越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构建研究”(课题编号:145013)的阶段性成果。

system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cursive system of Yue culture is a positive practice of the notion of Chinese content and international expression, the paper lastly specifically advances and analyzes three new strategies for the innovativ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cursive system of Yue culture; extract the symbolic concepts with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Yue culture, reconstruct the cognitive framework to highlight Yue cultural value, and enhance the narrative capacity of cultural discourse by telling good stories of Yue culture.

Keywords: Yue culture; international discursive system; cultural discourse; strategy analysis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回归初心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期,也是更响亮地传播中国声音、更自信地确立中国话语的时代。当前,传统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构建,特别是地域文化的对外交流话语体系创新性构建,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李潇君,2021)。越文化作为越族文化、越地文化,以及越人文化的多维交融,是浙江文化的根脉,具有文武兼容、道器并重、“风景常新,英贤辈出”等特点(王建华,2010)。

1. 越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构建的必要性

尽管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独立话语体系的国家,但传统文化对外话语体系构建却是一个较新的课题,文献检索表明还未有专门的越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研究。越文化是以长江、钱塘江及太湖为核心的吴越文化的重要支流,构建越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有助于提升传统文化自信、彰显中华地域文化底蕴。

1.1 越文化的发展脉络和显著特点

浙江一省,处于中国的东南沿海一线,围绕其域内的地理特征自古就有“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说法,面向东海、背倚群山、河网密布的地质特征虽不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但为南方远古先民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平台(余德余,2006)。特别是在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活动中,浙江域内陆续发现了大量的有别于北方文化特质的新石器文化遗迹。以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崧泽文化为代表的南方文化遗迹构建了整个中国南方文化谱系的底层,成为此后在整个长江流域出现的各种类型亚文化的母体。随着长江流域的深度开发,南北文化交流不断地深入,在长江全流域出现了大量的新文化系统。而在这一系列的新文化系统中,以浙东平原为文化主体发生地的越文化逐渐脱颖

而出。针对该区域的先秦历史记录,特别是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记述略显匮乏,如同吴国“泰伯奔吴”的立国传说一样,越国同样有过“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的说法。人们可从“泰伯奔吴”及“先禹之苗裔”这类先秦的族裔发祥传说中,一窥当时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和人群的流动,在多个文化区域的交汇地带及折冲区域,不同的文化之间产生深度的渗透和融合,使得既有的且相对落后的文化体系呈现出新的文化样式。而这样形成的新文化体系极具包容性,它们逐渐形成具有多种地域文化特点、广泛流行的特色文化,越文化可以说是这样一种文化系统的代表。

相较于其他的地域文化,越文化还有着—个显著特点,即文化自身演进的持续稳定,这一点可以从大量表现越文化特征的历史遗址、遗物中得到确认。从历史文化遗产层面来看,一个区域所拥有的历史遗存越多,它的地域文化就越发达。越文化的发生区域主要与先秦的越国疆域范围保持一致,即现今的杭绍宁平原地区。古越国于公元前490年在绍兴(古称“大越”“越州”)建都,因此普遍认为越文化的核心区域集中在“以绍兴为中心的方圆一百公里左右的地区”(王建华,2010),例如在《越绝书》中曾有记载:“越王勾践与吴战于浙江之上”(袁康等,1999)。此后,越国虽随着国力的增长,其势力范围略向北方有所延伸,但随着进入战国后期,其被楚所灭,整个文化的后期发展范围回归至旧都绍兴的故越地区,并至今维持在与现在的浙江基本一致的范围内(王长金等,2020)。以上历史流变的分析可见,整个越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自身的文化辐射范围,虽没有文化整体的强力外延,却可以基本保持自身的稳定。

1.2 越文化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意义

从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层面上来看,加强对外交流话语体系建设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点,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新任务。40余年的改革开放加深了中国与世界的全方位交流,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互动中,我国深刻地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宝贵价值,兼收并蓄、完善自我。在向中华传统文化和经典致敬的新时代,越文化对外话语体系构建应坚守越文化的价值核心,了解和清楚越文化价值优势之所在。在文化传播态势的结构形成过程中,需要将极具开发和包容的文化表现形式作为我国对外文化传播的推介核心,传达出中国自古以来就具备的在如何处理与他者开展文化互动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费孝通,2009)的价值观。

在新时期内外两大格局不断变化的背景之下,建构越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有助于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加强越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合作交流,推动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对话。在以会稽山为中心,以浦阳江和草娥山为两翼,辖山阴、诸暨、上虞、余姚、钱塘、余杭、由拳、乌程、海盐等地域的越文化核心区中,自东晋以来,受外收却不大放、内容却不偏废的鲜明地域文化影响之下,3000多处文化遗迹和3.5万件入藏文物传承至今,绍兴也因此荣登为“东亚文化之都”。以兰亭、大禹陵、越王台、古纤道、阳明洞天、王阳明墓、仓桥直街、印山越王陵、上虞曹娥庙、嵊州羲之墓、诸暨西施殿等为代表的有形文化遗产和以书法、黄酒、越剧、社戏、绍剧、水乡、台门、师爷、八字桥、乌篷船、大禹文化、阳明心

学、卧薪尝胆精神等为代表的无形文化遗产共同表征出越地独特文化的持久生命力。例如,阳明心学作为越文化无形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具有共同价值的哲学思想,这些思想多年以来在东亚地区备受推崇,展示出超时空、跨国界的能量(杨国荣,2020)。因此,将阳明心学作为越文化对外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不仅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和传承中华传统思想,而且能为解决人类社会当前所面临的矛盾冲突提供有益的启示和方案。综上所述,构建越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对发扬中华地域文化和展现传统文化智慧有着重要意义。

2. 越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构建所面临的挑战

基于越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构建的必要性,本节主要探讨话语体系构建所面临的理论挑战,分别从外来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发展机制亟待创新,以及对外交流话语体系的内部架构有待加强3个方面进行阐述。

2.1 外来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冲击

在当今国际社会,主权国家间的相互竞争不仅体现在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方面,还存在于围绕国际话语权所展开的软实力竞争方面。从围绕全球话语权所形成的全球实力布局来看,西方发达经济体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掌握着重要的全球性议题的话语走向,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新兴经济体的弱势话语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使得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所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在国际社会中不断得到认同。相比之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围绕诸多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和处理上,表现得差强人意,失去了基本的国家信誉。

然而,与有目共睹的经济建设成果相比,中国在针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宣传和推介工作中长期处于一种“自说自话”的简单状态,忽视对中华地域文化资源的改良和创新。许多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形象的认知还停留在多年以前的刻板印象和偏差误解中,这给传统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构建带来不少挑战。此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在对外文化交流领域经常出现“赤字”现象,即电视电影、图书报刊和文艺演出等文化产品的进口数量远远超过出口。西方文化对我国文化领域的影响无处不在,尤其是在节日庆典和娱乐文化等亚文化中,其影响程度不可谓不深,这从侧面反映出中国文化对全球文化所起到的正向影响十分微弱。外来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使得一部分年轻人对西方文化盲目认同、接受和模仿,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形成了世代性的断层。“文化赤字”所带来的隐性危机不可小觑,它可能加剧年轻一代对民族认同感的缺失和对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漠视(魏鹏举,2021)。

2.2 传统文化发展机制亟待创新

从文化发展机制的层面来看,目前对外交流话语体系构建主要存在2方面的问题

题:第一,文化发展机制相对落后,无法适应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的现代化传播手段;第二,总体来看,传统文化创新能力不高、多元性不足、传播力不强(徐稳,2013)。具体表现在:文化产业链构件不齐全;文化产业的市场化、集约化程度较低;部门之间缺少协作沟通意识。另外,资源分散、条块分割,制约了传统文化产业的顶层设计和市场化发展,导致传统文化发展缺乏有力的创新机制和核心竞争力(韩云川,2007)。人才缺乏和技术滞后也是传统文化总体创新力不强的主要因素,文化产业属于创意和传播行业,需要扎实的人才和技术支持,但有效的人才和技术培育机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创意公司不多、技术含量偏低、传播效果不佳、自主知识产权紧缺等成了制约传统文化行业发展的内生性问题,严重阻碍了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入国际舞台。可喜的是,在深化经济改革、实现全民基本脱贫的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得到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重视,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正逢大好的机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应运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来挖掘、阐发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弘扬超越时空、具有当代社会价值的文化精神,使传统文化内涵与当代社会相适应。

2.3 对外交流话语体系的内部架构有待加强

从对外交流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要素来看,话语主体、话语受众、话语权力关系,以及话语策略是对外交流话语体系内部构架的必要元素,如若对这些元素界定不清或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处理不当,则可能导致对外话语体系的整体构造残缺,进而影响到地域文化话语的有效表达和传递。话语研究者认为,话语即语言使用,其“包含形式多样的、通过符号传递意义的人类活动,这些活动和特定社会、文化、历史模式及使用这些模式的变化发展有联系”(Blommaert,2005)。在构建越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前,话语构建者应首先确定基本要素的范畴边界,强化它们的对外交流属性,并梳理好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目前越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中,话语主体的范畴成员应包括哪些,话语受众该如何界定,以及该运用哪些话语策略来组织话语体系尚未有清晰的认识。从外宣的角度来看,越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主体的范畴成员不光是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等,还应将民间机构、社会组织、民间群体、社会个体等纳入其中。话语主体在建构、组织和传递信息前,应充分考虑话语受众的身份、年龄、职业、文化修养、风俗禁忌等特征。另外,话语是具体的,与社会实践密不可分(Fairclough,2001),话语活动与其所处的行为场域是一种构建和被构建关系,语境在构建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联系话语与社会(Wodak,1995),因此语境在越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构建中的作用也需要得到强化和重视。语境具有生成、解释、协调、转化、创造等多种功能,所以越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考虑如何创设适当的语境,以及如何灵活选取和恰当运用话语策略来实现话语双方权力关系的平衡。

3. 越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构建策略

鉴于越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构建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如何根据国外受众的思维模式、语言习惯、信息需求等,有针对性地设计话语体系构建策略来突显越文化的特点和内涵,是当前创新越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构建所面临的主要任务。

3.1 提炼具有鲜明越文化特色的标识性概念

标识性概念具有民族性、独特性和原创性。认知语言学认为,概念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基石,借助概念人们可与外部世界发生互动,形成相对稳定的思维模式(Ungerer et al., 2006)。当前对外话语体系普遍存在概念焦虑、概念贫瘠、概念短缺,以及概念匮乏等问题,这使得人们渴望创新和丰富已有概念,打造类似“美丽中国”“和而不同”“文化自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内涵深刻、高度凝练的标识性概念(张小平等, 2021)。然而,创建标识性概念需要长期的文化积累,只有通过越地文化的感知体验、洞察抽象,以及运用高度概括的思维能力,才有可能创造性地提出凸显越文化的标识性概念。换言之,标识性概念的形成、转换和更新不能依靠脱离历史语境的假设推演,而是需要观察、分析、研判、抽象、概括等深层次的消化吸收过程,比如费孝通先生曾提出的“乡土中国”“文化自觉”“差序格局”等(费孝通, 2021)对中国社会具有深刻见解和深远意义的标识性概念,正是在其本人对中国近代乡村所开展的大量调查的基础之上形成的。

对于越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构建来说,提炼具有鲜明越文化特色的标识性概念是推动越文化走向国际舞台的有效机制,甚至关系到越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构建能否破局。我们认为,越文化标识性概念能为越文化对外交流贡献新的话语思想和原创性话语资源,是越地文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经过长期积淀、总结概括和提炼升华的成果,它们能够反映出越文化中最本质的思想价值和概念范畴。为此,我们应摒弃生搬硬套既有的词汇、盲目借鉴西方话语等不当的做法,根据话语体系的内在逻辑,特别是越文化思想的主旨要义,深入挖掘越文化的精神实质,“把内容建设放在第一位,突出思想内涵、彰显价值观念”(刘奇葆, 2014),凝练出一批能够准确地描述越文化精髓、易为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

在打造越文化标识性概念时,需要杜绝被一味迎合西方文化的“洋概念”所误导,也要防止被追求标新立异的“伪概念”“假概念”所蒙蔽。越文化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应以传承优秀地域文化为基本目标,符合国际文化传播规律,做到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突显越文化的原创性、地域性和时代性。例如,“胆剑精神”这一新概念被看作越文化的精神内核,反映出越文化中人文价值的基本态度和取向,高度概括了2500多年以来越文化集中体现的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坚韧不拔的精神内涵,被称为具有鲜明越文化特色的、适合对外交流的标识性概念。在提炼标识性概念的过程中,还需关注话语内部结构的层级性和完整性,改进越文化话语的言说方式、言说效果和言说艺术以提升越文化的吸引

力和感染力。同时,为确保话语传播的有效性,话语构建者应具有移情能力,尽可能做到“换位思考”,从话语受众的母语特点和文化背景出发构建通俗易懂、自信亲切的越文化标识性概念。

3.2 创新认知框架,凸显越文化价值

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主要依赖认知框架和概念隐喻,“21世纪思维使我们能够理解体验性经验如何塑造思想,世界观是什么,以及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是如何依赖框架和隐喻”(Lakoff,2009)。认知框架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模式和帮助人们理解现实的心理结构,决定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方式,作为一种视/识解操作方式,框架为话语和话语体系提供概念语义背景和认知视角,“有时候人们可以借助框架构拟他们想要的社会现实”(Lakoff,2006)。认知框架作为一种意义构建工具,可应用于对外话语体系构建中,例如,当代美国政治的外宣话语常使用反恐框架,该框架包括恐怖分子、极端组织、反恐特勤队、军事行动等语义角色。这些角色之间的关系,以及反恐框架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等框架的关系,共同将美国政府塑造成世界维和部队的形象来获得政治正当性和国际话语权,从而将不正当的对外干涉或海外战争合法化。

因此,创新认知框架能够突显越文化价值,推进越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构建。由于框架之间彼此相互激活,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依赖相互连接的概念系统构建和理解话语,话语的意义构建关涉认知框架之间逻辑关系的提取(Lakoff,2008)。创新认知框架是指在解构已有框架的基础上形成新的认知框架,即调整或改变原有思维模式,建立新的思维模式。在越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构建中,创新认知框架有助于话语受众更好地感受和理解越文化。以绍兴台门为例,台门是越文化中具有地域性特色的居住建筑,构型可追溯至流行于战国到西汉时期的古老建筑形式“高台建筑”,先民以高台表达渴望与神沟通、求神庇护的原始情愫。从文本资料来看,目前有关绍兴台门的认知框架主要是历史建筑框架,该框架突显台门的构造风格、建筑规格、建筑特点、建造时间等语义角色,话语构建者通常以静态描写的方式呈现台门建筑信息。我们认为,相较于历史建筑框架,文化遗产框架更能突显绍兴台门的文化遗产价值,提高该建筑在话语受众概念系统层面的认知地位。文化遗产框架有助于强调历史遗存、民族智慧结晶、文化传承和保护等语义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遗产框架与民族精神、旅游文化产业等框架的关系,从而将绍兴台门表征为越地文化的典型象征,凸显越地文化的独特价值和内涵。

同样,对于具有浓郁越文化特色的绍兴黄酒来说,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框架重构原有的黄酒品牌框架更能凸显其独特的越文化价值。黄酒源于中国,与啤酒、葡萄酒并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酒类,绍兴黄酒作为黄酒中的佼佼者,是我国第一个原产地保护产品,其酿制工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绍兴黄酒的品牌保护和知名度得到较大提升,但由于酒类行业市场竞争激烈,光靠品牌效应难以让绍兴黄酒在国际市场中获得长久的一席之地。为了突出绍兴黄酒的文化特色,我们需要创新

认知框架,在外宣活动中着重推广绍兴黄酒酿造技术的“非遗”特点、性质和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属性,强调绍兴黄酒工艺代代相传的生命力及其所象征的传承精神。与黄酒品牌框架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框架不仅关涉酿制工艺,还关涉文化保护、文化内涵、历史脉络等语义角色,能够在概念系统层面调动话语受众的注意力分配,让他们在关注黄酒的色泽、口感和质量的同时,更多地关注绍兴黄酒酿造技术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价值,从而凸显绍兴黄酒独特的文化属性和文化价值。

3.3 讲好越地故事,增强文化话语叙事能力

相对于一般性话语而言,文化话语更强调文化语境、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历史背景等因素,要求话语构建者具有良好的话语叙事能力;缺乏话语叙事能力的文化沟通,很可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鉴于此,我们需要在积极地了解和借鉴西方话语叙事模式的基础上,制定既凸显中国文化特色又符合国际社会叙事传统的文化话语叙事策略。“寻找中国文化脉搏和世界文化同频共振的结合点,不断推陈创新,推广现代的文化……使中国话语满载中国传统和现代文化,成为更多文化的记忆”。(王磊,2020)格莱斯主张以“非自然意义”分析言语交际中的话语意义,认为任何成功的交际都取决于听话人对说话人交际意图的准确理解,为达到成功沟通的目的,话语双方需遵循会话的合作原则,合作原则下辖4个准则: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联准则和方式准则。(保罗·格莱斯,2021)具体而言,话语内容应包含话语目的所需要的信息,避免累赘冗长;话语内容应真实准确,不能虚假或缺乏足够证据;与话语主题相关联;清楚明白地表达要说的话。根据格莱斯的合作原则,为增强越文化话语叙事能力,首先在语言组织上应避免晦涩歧义的表达,力求简练、有条理;其次在话语叙事模式上,避免简单的平铺直叙,在强调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力求叙事方式的多元化;再次在话语叙事原则上,做到有理有据、逻辑清晰,既具有清晰明确的话语主题,又具有引人入胜的话语内容。

越文化话语叙事能力具体体现在讲好每一个与越文化紧密相关的故事上。从认知视角来看,故事是心理模式,反映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形成故事的必要构件是事件。例如通过生动有趣的语言叙述王羲之、谢安、谢灵运、贺知章、陆游、王阳明、鲁迅等绍兴名人的生平故事,介绍和推广越文化中的“名士”文化。近些年,绍兴文化峰会的定期召开就是讲好越文化故事的一个重要窗口,其不仅为挖掘越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搭建了沟通平台,更为国际友人了解越文化、探讨越文化提供了交流窗口。2021年该峰会的主题是“鲁迅与现代文化价值重建”,以学术研讨的方式将鲁迅这一“名士之乡”的代表人物推向世界舞台。另外,非遗文化的传承者、自媒体网络主播等也加入到讲好越地故事的队伍中来,如擅长于绍兴评话的魏昉昊,通过网络平台传承、创新绍兴非遗文化和茶馆听书文化;网络主播许莉霞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带货的方式分享越文化传统小吃,向国内外朋友传播越文化魅力。

讲好越地故事、增强越文化话语叙事能力需要注意中外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因为外国受众未必能够理解和认同我们世代相传的传统经典思想。越文化中的阳明学说主

张通过“知行合一”达到“和为贵”的状态,实现“和谐共生,美美与共”,但西方的主流观念是“零和博弈”,认为一方胜利赢得了利益,另一方就会吃亏受损,所以他们很难理解中国的“中庸之道”。此外,为了展示越地文化的审美特征,我们习惯以烟雨朦胧场景下妙龄姑娘撑着雨伞的图片来突显江南美景的秀气,但国外受众可能会误读为越地气候不佳、缺少阳光。因此,面对不了解越文化、不懂中文的外国受众,我们要了解文化差异,用他们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讲好越地故事,从而更好地提高越文化话语叙事能力。

4. 结语

越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构建是“中国内容、国际表达”的积极实践,为使世界更准确地理解越地文化,我们需要在全球语境下构建越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一方面,话语内容必须植根于越地文化传统,突出越文化的价值和智慧;另一方面,话语风格上应强调国际化表达,注重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以易于他们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讲好越文化故事。概括而言,话语构建者可通过凝练具有鲜明越地文化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创新认知框架凸显越地文化价值,以及讲好越地故事、增强文化话语叙事能力等策略来创新构建越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 保罗·格莱斯. 言辞之道研究[M]. 姜望琪,杜世洪,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 费孝通,2009.“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J]. 名人传记(上半月)(8):50-51.
- 费孝通,2021. 乡土中国[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何方川,韩琦,2020. 文明、文化与文化交流[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韩云川,2007. 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与弥补[J]. 科学社会主义(6):92-96.
- 刘奇葆,2014. 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N]. 光明日报,05-22(3).
- 余德余,2006. 浙江文化简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
- 孙吉胜,2017. 传统文化与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J]. 外交评论(4):1-31.
- 王长金,彭庭松,2020. 吴越旧邦遗泽在[M].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 王建华,2010. 中华文化格局中的越文化[M]. 北京:人民出版社.
- 王磊,2020. 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意义、任务与策略[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53-60.
- 魏鹏举,2021 文化强国战略格局下中国文化贸易的现状与愿景[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28-34.
- 陈才俊,2010 史记·世家精粹[M]. 北京:海潮出版社.
- 徐稳,2013. 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文化传播的困境与出路[J]. 济南: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96-103.
- 李学磊,2021.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的讲话[EB/OL]. 新华社,2021-06-

- 01(2). http://www.gov.cn/xinwen/2021-06/01/content_5614684.htm
- 袁康,吴平,1999. 越绝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杨国荣,2020. 王阳明[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张小平,蔡惠福,2021. 主体性、创新性: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研究中标识性概念的生成路径[J]. 传媒观察(7):5-12.
- BLOMMAERT J,2005. Discourse:A critical introduction[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IRCLOUGH N,2001. Language and power [M]. London:Longman.
- LAKOFF G,2006. Whose freedom: The battle over America's most important idea [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LAKOFF G,2008. Political mind: Why you can't understand 21st century American politics with a 18th century brain[M]. New York:Viking Books.
- LAKOFF G,2009. The political mind:A cognitive scientist's guide to your brain and its politics[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UNGERER F,SCHMILD H J,2006.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 Longman.
- WODAK R,1995. Critical linguistic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 //Handbook of pragmatics: manual[M]. Amsterdam:John Benjamins, 204-210.

作者简介:

郑红莲,女,1979年7月生,江西吉安人,文学博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大学外语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话语分析、认知语言学研究。

张晨,男,1987年9月生,天津人,法学博士,绍兴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及历史研究。